

江 苏

J i a n g s u

词文化

c i w e n h u a

史 论

s h i l u n

◆ 高峰 著

 凤凰出版社

I207.23
201239

阅 览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07WXB002)

江 苏

j i a n g s u

词文化

c i w e n h u a

史 论

s h i l u n

◆ 高峰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江苏词文化史论 / 高峰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506-1000-2

I. ①江… II. ①高… III. ①词 (文学) — 诗词研究
— 江苏省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5848号

- | | |
|---------|--|
| 书 名 | 江苏词文化史论 |
| 著 者 | 高 峰 |
| 责 任 编 辑 | 卞 岐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邮编: 210038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9.625 |
| 字 数 | 277千字 |
| 版 次 |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000-2 |
| 定 价 | 35.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68037411) |

绪 论

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关系研究,在中西文学研究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19世纪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依据“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原则,对文学艺术展开研究。其中,一部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和政治、制度、风习等文化氛围,被认为是艺术产生的最重要因素。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前辈学人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对文学发展、风格形成的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域文化研究蓬勃发展,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关系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杨义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前沿命题,涌现了诸如《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蒋寅)、《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李浩)、《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景遐东)等代表性论著,都为古代文学研究开拓了多学科交叉探索的新视野。

江苏区域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永嘉东渡以来,伴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南移、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江苏文化呈现出繁盛的局面。中唐以降曲子词的兴盛,更为江苏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旖旎的风情。唐五代以来,江苏词坛先后涌现出诸如李煜、冯延巳、范仲淹、秦观、叶梦得、范成大、蒋捷、倪瓒、沈宜修、陈维崧、徐灿、顾贞观、黄景仁、张惠言、蒋春霖等等杰出的词人,创作出大量歌咏江苏风土人情、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优秀词作,产生了诸如南唐词派、吴中词派、阳羨词派、常州词派等等著名的词学流派,留下了《艺苑卮言》(王世贞)、《灵芬馆词话》(郭麐)、

《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蒿庵论词》(冯煦)、《白雨斋词话》(陈廷焯)、《艺概》(刘熙载),以及《宋六十名家词》(毛晋)、《词律》(万树)、《词林正韵》(戈载)等等影响深远的词学著作。王安石、苏轼、周邦彦、贺铸、陆游、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萨都刺、王士禛、厉鹗等词坛大家先后流寓江苏,也都创作了大量著名词作,深刻影响了江苏词坛的繁兴与发展。民国以来,江苏词坛又先后涌现出吴梅、陈匪石、汪东、任讷、赵尊岳、唐圭璋、缪钺、卢前、沈祖棻等众多知名学者,为现代词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导、推动作用。

江苏词学的发展轨迹与中国文化的演变历程紧密相连,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本书立足于词学发展史和江苏文化演进史的高度,力图运用人文地理学、区域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 and 知识,对研究对象进行审视、观照和诠释,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互动发展的视角,将江苏词学的发展放置于江苏文化发展的环境当中,截取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词坛现象,进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以点带面地揭橥历史演进过程中江苏文化特征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轨迹,并且以时代文化、地域特色的动因,探析词学演变的实质,以及江苏文化风气对于词体文学创作思潮的濡染、词学流派的深刻影响;在展现江苏词学独特成就的同时,形象地凸显出词作文本所渗透出来的文化魅力。

目 录

绪论	1
1. 金陵文化与南唐词风	1
2. 宋词与扬州	17
3. 论京口的宋词坐标	27
4. 苏轼与江苏	36
5. 贺铸的江苏情缘	49
6. 范成大的苏州情缘	56
7. 吴文英的苏州情缘	66
8. 论元代江苏词坛	72
9. 论明代苏州才子词	85
10. 苏州藏书文化的词学贡献	111
11. 论晚明秦淮歌姬词	120

12. 吴绡词的情感世界	131
13. 沈宜修词的人生感怀	139
14. 叶纨纨诗词的伤心境界	152
15. 叶小鸾词的青春咏叹	158
16. 徐灿词的易代之悲	168
17. 清初案狱与江南词坛	178
18. 论清代扬州词坛	189
19. 论清代常州词坛	217
20. 顾贞立词的艺术魅力	242
21. 贺双卿词的独特价值	253
22. 熊琏词的精神追求	263
23. 庄棫词的艺术价值	271
24. 金陵怀古词的文学生成及表现	278
25. 论姑苏怀古词	290
余论	300

1. 金陵文化与南唐词风

一、南唐金陵文化的繁盛基础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这是南唐亡国之君李煜在其《破阵子》词中，追念故国的繁华景象。南唐(937—975)，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江淮地带的一个小王朝，历烈祖李昇、元宗李璟、后主李煜三世，享国 39 年；当其极盛之时，据有 35 州之地，人口约 500 万。南唐继承唐朝礼仪典章制度，依托江淮自然、人文条件，吸纳北方中原英杰豪士，发展生产，富甲东南，在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北宋的经济恢复、政权建构、文化繁兴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障和人才资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南唐定都金陵，使得这座六朝金粉都市重新焕发了生机。三国东吴以来，东晋以及南朝宋、齐、梁、陈相继定都金陵，形成了繁盛绚丽的文化发展态势。但是，隋朝一统天下以后，为了消弭南方王朝近 400 年统治的影响，刻意压制金陵的地位。隋文帝下令摧毁六朝宫殿，诸如台城、华林园、乐游苑等一大批六朝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尽数拆毁。到了唐高宗武德末年，金陵的地位降至润州辖属下的一个小县，与号称“扬一益二”的近邻扬州的富庶繁华真有天壤之别。于是，许多唐代文人途径

金陵,纷纷抒发出“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刘禹锡《乌衣巷》)、“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许浑《金陵怀古》)等等沧桑浩叹。

金陵城的再度繁兴,始于五代十国的动荡时世。唐末各路军阀长期混战,东南地区崛起了以杨行密为首领的强大军事势力,这就是所谓的杨吴政权。杨吴定都于唐代淮南节度使所在地扬州,同时又看中了金陵城得天独厚的防守形势,将其定为西都。由于战乱频仍,扬州城数遭兵燹,加之江淮漕运系统的停废,昔日的繁华再难复现。于是,统治者更多地将迁都的目标指向金陵。杨行密死后,杨吴政权更迭频繁,大丞相徐温秉吴实权,并且产生了取代之心。为了控制江南,与杨吴政权分庭抗礼,徐温派谋士陈彦谦营建隋唐时期早已废弃的金陵城,并于天祐十四年(917)迁居于此。在徐温操秉杨吴实权的过程中,其养子徐知诰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天祐六年(909),徐知诰刚满22岁,被徐温任命为昇州(今江苏南京)防遏使兼楼船副使,前去修整金陵城并操练水军。九年(912),徐知诰协助大将柴再用平定李遇叛乱,建立了功勋,升任为昇州刺史。当时军阀混战,武夫悍将侵扰百姓,使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徐知诰上任后,即着力扭转这样的局面。当时“州县吏务赋敛为战守,知诰独褒廉能,课农桑,求遗书,招延宾客,倾身下之。虽以节俭自励,而轻财好施,无所吝者”。正由于他励精图治,招纳贤才,故而治绩斐然,声名鹊起,大批儒士闻风向慕,纷纷投奔到其门下,“以宋齐丘、王令谋、王翊、曾禹、张洽、徐融为宾客,马仁裕、周宗、曹侬为亲吏”;“是时中原多故,名贤耆旧皆拔身南来,知诰豫使人于淮上贻以厚币,既至,縻之爵禄,故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①。孙晟、韩熙载、江文蔚、常梦锡、高越、史虚白、陈陶等著名文士,纷纷从中原南下进入吴国。这就为徐知诰赢得民心,进而建立南唐政权奠定了基础。徐温闻其治政名声,亲自巡察金陵,“见其城隍浚整,楼堞完固,府署中外肃肃,咸有条理”,心里十分满意,遂将自己的治所迁至金陵,而将知诰调任润州。“时金

^①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五,第185、18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陵之民，顾怀其惠，莫不心折气沮，但逼迫义祖（徐温）之威，而无敢建白者”^①，但是人心的向背已判然分明。

徐温死后，徐知诰加速了争夺政权的步伐。天祚三年（937），徐知诰逼宫废吴，建立齐国，在金陵即皇帝位，改元“昇元”，任命百官，封吴国废帝杨溥为让皇。昇元三年（939），在朝廷诸多大臣的一片“恳请”声中，徐知诰复姓李，改名为“昇”。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门第，为篡夺帝位寻找合适的依据，他宣称自己是唐朝李氏皇族的后裔，乃唐宪宗李纯的五世孙，并且改国号为“唐”。为了区别李渊建立的大唐王朝，史称以江淮为中心的李昇建立的唐政权为“南唐”。

李昇自幼饱尝战乱之苦，懂得广大百姓热切盼望和平安宁生活的心愿，所以南唐建立之后，他便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保境息民，发展生产，革除弊政，推行文治，促使南唐的经济很快得以恢复，文化也出现了繁兴的局面。李昇重用儒雅文人主政，他在昇元六年（942）十月颁布的诏令中指出：“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众。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为朕举用儒者，罢去苛政，与吾民更始。”^②烈祖还从组织制度上整顿官僚队伍，命张延翰为礼部尚书，赋予其选拔各级官员的重任，“士有献书论事者，第其优劣选用，烈祖悉以委延翰，号为精效称职。兼选事，务进孤贫，吏不敢为奸利”^③。正是由于南唐烈祖重用文臣，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朝廷官员的素质和结构，初步形成了文官统治的政治模式，对此后北宋政权组织形式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儒雅文士的秉政，也促进了地方稳定和社会发展，赢得了广泛的民心。此外，南唐烈祖还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于昇元二年（938）正式设置太学，并下令“删定礼乐”，恢复传统的儒学教育，昌明教化。由于烈祖着力招揽儒雅贤俊、复兴文教、收集典籍，使得南唐的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人文胜地、才俊渊薮。

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进一步推动了文官统治的政治模式，并且

① 史温：《钓矶谈》，《知不足斋丛书》本。

② 陆游：《南唐书》卷一，《四部丛刊续编》本。

③ 陆游：《南唐书》卷六，《四部丛刊续编》本。

以自身儒雅的文化气质越发引导着南唐文人文化的烜赫和繁兴。在他们的词作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金陵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的旖旎风味。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二称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他从小出身在帝王富贵之家,后来又做了江南富庶之国的君主,生活自然是极其豪华奢靡的。他的前期词中有不少内容,就是描写南唐皇宫内歌舞宴乐的场景。例如《浣溪沙》词写道: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这首词真实地记录了帝王之家的生活景象。金炉香兽、红锦地衣、金钗歌舞、酒恶嗅花,等等描写都非常形象地刻画了华贵、奢靡的宫廷生活。最后一句又添上了重要一笔:“别殿遥闻箫鼓奏。”别的宫殿内箫鼓管弦也演奏了起来,那边的嫔妃宫娥又在演出什么新鲜花样的歌舞来讨皇上的欢心呢?他当然要即刻起驾,前去观赏一番。这样就显示了一个时间的延展,表明这种纵情欢乐是日以继夜、无休无止的。南唐境内桑麻遍野,盛产丝绸、布帛,如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宣州的五色线毯等。朝廷对官员的奖赏,也多奖励帛品。监察御史张宪上书,李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①。李后主描摹南唐宫廷生活的诸多词作中,往往充斥着红罗绮锦的美艳词句,例如“绣床斜凭娇无那”(《一斛珠》)、“淡淡衫儿薄薄罗”(《长相思》)等;他还“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幂其壁,以白银钉玳瑁而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中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又于花间设彩画小木亭子,才容二座,煜与爱姬周氏对酌于其中,如是数处。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由于纺织业的发展,染色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李煜宫人“染碧,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②。这种若有若无、近乎青绿色的色泽效果,需要高超的印染技艺,在当时享有盛誉,金陵市内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非但如此,南唐皇宫内的奢靡生活,还经常别出心裁,

① 佚名:《江南余载》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佚名:《五国故事》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花样翻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引《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窋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窋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窋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

不仅皇宫奢靡绮丽，南唐许多大臣的生活同样轻靡华贵。中书侍郎韩熙载目睹南唐国势日蹙，难以挽救，遂蓄女乐四十余人，与客杂居，帷簿不修，彻夜宴饮，放荡嬉戏。萧俨、江文蔚、常梦锡、冯延巳、徐铉、徐锴、潘佑、张洎等人俱集其门，顾闳中所绘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即描绘其豪宅内夜宴之盛景。陶岳《五代史补》卷五则生动、详细地描述了韩府内混居杂处的情况：“韩熙载仕江南，官至诸行侍郎。晚年不羁，女仆百人，每延请宾客，而先令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笏，无不曲尽，然后熙载始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复有医人及烧炼僧数辈，每来无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伪主（指李煜）知之，虽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过，因命侍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而熙载视之安然。”

南唐词的涌现，与金陵城市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当然也离不开江南秀美柔静的水乡风情的深刻影响，它表现在词人的作品当中，就处处闪现出波光粼粼、清新淡雅的色泽：“回首绿波三峡暮”、“西风愁起绿波间”（李璟《摊破浣溪沙》），“碧波池皱鸳鸯浴”（冯延巳《鹊踏枝》），“小塘春水涟漪”（冯延巳《临江仙》）。素雅清淡的自然景观，给人以野逸疏朗的审美感受，也使得曲子词作的格调显得非常空灵清远。南唐词清丽疏淡风格的生成，也受到了南朝时期流行于长江下游的吴歌的影响。吴歌的特点是抒情细腻，语言清新，大多描写爱情相思和离愁别恨。这种文学遗产影响到南唐君臣词体创作中言情的内容和技巧。清人徐鉉在《词苑丛谈》卷四中指出：“予谓巨源之论词之源于乐府，是矣；独所言《子夜》、《懊侬》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是词贵于言情矣。”南唐词受到《子夜》、《懊侬》等吴歌的影响，注重表达细腻的内部感受，吐属清华，含蓄蕴藉。尤其是李煜词出语天然，言短情长，更加具备南朝吴歌的神韵。南唐词基本上都是君主和权贵大臣娱宾遣兴之作，自然

跟南朝梁、陈两代宫体诗具有一定的类似性。李煜前期词的创作,更加显示出华贵富丽的生活环境、美女如云的声色享受和及时行乐的情趣态度,这些内容与宫体诗可谓颇为接近。但是,从整体而言,南朝宫体诗侧重对于宫女秀色的静态描摹,将之作为华美的器物一般肆意地把玩,欣赏者本人对那些美貌的宫女并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爱意。南唐词则通过对身边美女的细致描摹,渲染出宫廷生活的富足、美妙,如李煜的《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同时,在其《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蓬莱院闭天台女》等词作中,则非常形象逼真地表露出真挚炽热的爱情。另外,如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鹊踏枝》(几日行云何处去)等词作,于女子相思愁怨的表象之外,又似乎蕴含着比兴寄托的政治感怀。因此,南唐词较之南朝吴声歌曲以及梁、陈宫体诗歌,内涵更加复杂,意蕴更加深厚,格调也更加清雅,从而开创了江南文学发展的新局面。

二、金陵文化笼罩下的南唐词风

虽然说,南唐词在表现君主奢靡生活方面,与花间词具有内容上的相似性,但是由于金陵文化与西蜀文化的差异等因素,致使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花间词与南唐词的创作主体颇不相同:花间词主要出自晚唐冶游词人以及前蜀、后蜀朝廷当中的文臣;南唐词则出自南唐君王及其身边的显贵宰臣,两者的精神气质、文化品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花间词的产生,得力于五代之际西蜀地域相对和平的生存环境、繁华富庶的经济背景,以及巴蜀文士倾城游乐的习俗风尚。在统治者奢靡风气的熏染之下,寄生于西蜀的广大词人纷纷沉迷在对醇酒美人的追逐之中,寻求乱世之中的心理慰藉和感官享受,导致花间词作的内容题材带上了鲜明的艳情化、享乐化的倾向。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指出:“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非常形象地展现出西蜀整个社会的

享乐风尚。在这样的时风濡染之下，文人们不免行为放纵而不拘礼法，以狎游宴饮为乐，“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是声色大开的特定时代所产生出来的俗艳化的文学倾向，体现出鲜明的“伶工之词”的功能与特质。

南唐时期的妓乐文化同样非常兴盛。中主李璟“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①。后主李煜性尚奢侈，“大展教坊，广开第宅。下条制则教人廉隅，处宫苑则多方奇巧”，“以户部侍郎孟拱辰宅与教坊使袁承进”^②。他还“常微行倡家，乘醉大书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风流教法。’”^③后主的昭惠皇后周氏，“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尝为寿元宗前，元宗叹其工，以烧槽琵琶赐之。至于采戏、弈棋，靡不妙绝。……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尝雪夜酣燕，举杯请后主起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矣。’后即命笺缀谱，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俄顷谱成，所谓‘邀醉舞破’也”。又有宫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后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所作《邀醉舞》、《恨来迟》二破，久而忘之。后主追念昭惠，问左右，无知者，流珠独能追忆，无所忘失，后主大喜”^④。正是在如此娱乐文化的背景下，南唐君臣所填制的曲子小词，也便如同花间词一样，具备了侑酒佐欢、娱宾遣兴的功能，即如宋人陈世修在《阳春集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公（指冯延巳）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李煜亡国之前的宫廷词作，轻靡华艳丝毫不逊于花间词，因此明人沈际飞评价曰：“后主、炀帝辈，除却天子不为，使之作文士荡子，前无古，后无今。”^⑤

但是南唐君臣的文化品位、艺术修养要远远高于花间词人。烈祖李昇出身微贱，笃志向学：“时江淮初定，州、县吏多武夫，务赋敛为战

① 郑文宝：《南唐近事》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张宪：《谏后主书》，《唐文拾遗》卷四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七引《诗话类编》，第25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陆游：《南唐书》卷十六，《四部丛刊续编》本。

⑤ 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明万贤楼刊本。

守，异独好学，接礼儒者”，仕吴期间“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用之”^①；建立南唐之后，他宽仁修政，广施恩信，通过保境安民的政策而得到了久经战乱的江淮人士的拥护。因此众多有名才士汇聚在南唐境内，为此后由李璟、李煜主持的南唐文苑储备了雄厚的创作队伍。李璟幼承其父儒雅之风，“趣尚清洁，好学而能诗。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②，“多才艺，好读书，便骑善射”^③。他精通诗词，书学羊欣，尤善八分，尽显清雅的韵致。宋史温《钓矶立谈》称赞李璟“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朴素，宛同儒者，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士人传以为玩，服其新丽”。

后主李煜比起乃祖乃父，更有青出于蓝的风姿。他“广颖隆准，风神洒落”^④，“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⑤，能够校讎编秩图书，题跋书画，“精究六经，旁综百氏”^⑥；工书，学柳公权，传钟、王“拨镫法”，续羊欣《笔阵图》，有“聚针钉”、“金错刀”、“撮襟”诸书体，其中金错刀书“虽若甚瘦，而风神有余”^⑦；善画，尤工翎毛墨竹，“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⑧；收藏之富，笔砚之精，冠绝一时。他更“洞晓音律，精别雅郑”^⑨，“凡度曲莫非奇绝”^⑩，为南唐倚声填词第一高手。因有这祖孙三代儒雅风流之君连续主政，南唐举国人文精神高涨，正如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所赞：“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辏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

南唐所管辖的区域，文人气息非常浓郁，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纸、笔、砚、墨，无一不与南唐密切相关。李煜写字选用宣州（今安徽宣城）

①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二，第765、766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 龙衮：《江南野史》卷二，豫章丛书本。

③ 陆游：《南唐书》卷二，《四部丛刊续编》本。

④ 史温：《钓矶立谈》，知不足斋丛书本。

⑤ 陈彭年：《江南别录》，学海类编本。

⑥ 徐铉：《李煜墓志铭》，《徐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 夏文彦：《图绘宝鉴》，《四库全书》本。

⑧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第10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⑨ 徐铉：《李煜墓志铭》，《徐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⑩ 邵思：《雁门野说》，宛委山堂《说郛》本。

制笔世家诸葛氏特制的紫毫笔,又将其妻娥皇所使用的特别精致的紫毫笔命名为“点青螺”。他使用的墨是被称为南唐一宝的著名墨工李廷珪创制的松烟墨,当时就有“天下第一品”的美誉。李煜还亲自主持制造了一种质地细薄光润的澄心堂纸。这种纸被誉为“众纸之冠”,到了北宋时期身价倍增,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新五代史》,李公麟绘制《五马图》、《醉僧图》等名画,所用的都是澄心堂纸。李煜使用的歙州生产的造型优美、质地温润的龙尾砚,更是南唐一宝。他所收藏的一座天下罕见的宝石砚山,利用天然奇石精心制作而成,更是鬼斧神工、妙手天成的艺术品。天下神笔、奇墨、名纸、宝砚,尽为一人独占拥有,这样一位具有深湛文化修养和高雅审美趣味的词人提起笔来写诗填词,其文学风格自然也就不同于流俗。

他的高雅情趣也表现在对于皇宫环境的艺术化的改造。据陶谷《清异录》卷下记载,在南唐皇宫里面,有专门的主香宫女,负责根据不同的环境燃起不同的香料,御用的香料,都是用丁香、檀香、麝香等以梨汁蒸干精制而成。在李煜的词里,享乐的生活也便增添了高雅的情调,例如《玉楼春》词所云: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栏干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整首词描写皇宫之内歌舞升平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两句。一场酒宴结束之后,君王就要回后宫歇息了。他不让侍从们点上蜡烛在前面引路,破坏那美丽朦胧的月光。原来他还想骑马踏月,尽情地享受清夜之下潇洒清幽的情趣。据宋人王铎《默记》记载,“江南大将获李后主宠姬者,见灯辄闭目云:‘烟气!’易以蜡烛,亦闭目云:‘烟气愈甚!’曰:‘然则宫中未尝点烛耶?’云:‘宫中本阁每至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由此可见,李煜皇宫的奢华是如此的清雅别致。

在南唐二主的风尚引领之下,朝中众多“俊杰通儒”积极参与曲子词作的填制,他们的笔法、格调自然要较之花间词人显得更为高雅深

致。冯延巳出身宦宦之家,“有辞学,多伎艺”^①,宋史温《钓矶立谈》称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如倾悬河,暴而听之,不觉膝席之屡前,使人忘寝与食”。他工诗,虽贵且老不废,“识者谓有元和词人气格”^②;又擅书法,似虞世南;尤喜乐府小词,是李璟文学创作的主要唱和伙伴。其词“平视温、韦,下开欧、晏,为南方词家鼻祖”^③。南唐君臣这样的儒雅风流、才富学赡的上层文化人来从事小词写作,势必将自身的学识襟抱自觉不自觉地熔铸到此类原先只属秦楼楚馆的流行歌曲之中,提升其审美品位,使其风格趋向高雅,呈现出比花间词更为士大夫化的体貌与内蕴。宋人李清照在《词论》一文中,即对南唐词作的文雅表示出格外的称赞:“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南唐君臣特有的极为高雅丰富的“学识襟抱”为艳体小词输入了抒情新质,使南唐词成为词体文学发展演变新阶段的标志。

与此同时,南唐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行将亡国的危殆形势,又使得李璟、李煜、冯延巳等词人产生了鲜明的忧患意识。南唐虽然在十国当中号称“大邦”,但是它地处江淮平原、丘陵区域,不像西蜀那样四境有山川之险可以倚仗,与中原只隔一条淮河,简直无险可守,面对北方政权的虎视眈眈,南唐君臣和广大百姓始终身处在惶恐、忧惧之中。而且江南山青水秀,使得当地民众性情温厚柔静,尚文厌武,缺乏北方之人雄健强悍的习性。烈祖颇有自知之明,立国之初就“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④。到了中主时代,更是屡遭北方后周世宗大军的侵扰和挤压,不得不割地称臣,削去国号,成为退处江南的外藩小邦。及至后主时代,北方建立了赵宋政权,对南唐造成了更大的威胁。面对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南唐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后主李煜“尝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⑤。公元975年,享国39年的南唐政权终于在宋朝军队的打击下凄然灭亡。身处在如此凄迷无奈

① 马令:《南唐书》卷二一,《四部丛刊续编》本。

② 陆游:《南唐书》卷十一,《四部丛刊续编》本。

③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④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二,第76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⑤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二,第77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